

●
方 铭 著

我國文學史



方 铭 著

我國文學史

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战 国 文 学 史

方 铭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)

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6 印张 5 插页 字数 28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 定价:29.00 元

ISBN7—5430—1576—5/K·167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序

褚斌杰

战国时代，正象历史上对它的称名，是一个列国争雄，战乱频仍的时代。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的一个大变革时代。夏、商、（西）周以来的旧制度、旧传统，已不可挽回地趋于瓦解。“礼崩乐坏”，诸侯纷争，杀人盈野，整个社会陷入到大的危难动乱之中。社会需要新生，危机促人思考。自春秋后期，随着“私学”兴起而造就出来的大批士人，因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而壮大，他们“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”，或在各国统治者的罗致下，走上政治、外交、军事舞台；或到处游说，聚徒讲学，大都围绕着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，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各种家派，互相交锋，彼此论战。这就出现了战国时代所谓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

当时学派众多，思想活跃，能够在广阔的领域探索问题，大胆地提出各种不同见解，这与在当时新旧交替的斗争中，思想禁锢较少，思想比较解放有关。从当时的主要派别如儒、墨、道、法等各家看，他们虽然主张不同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，但都冲破了旧思想的牢笼，对西周以来的旧制度、旧意识、旧传统，表现出或修正，或反对，或完全否定的态度。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探索求新的时代。是一个需要巨人，而确乎出现了巨人的时代。

正是这一思想上的解放，文化巨擘的相涌而出，促使当时的文化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构成了一个思想上百家争鸣，学术文化空前繁荣，各体文学（散文、辞赋）争奇斗艳的局面。

战国时代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，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理性和热情相结合。理性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注，并究其底里的深层思考；而热情则表现为这种关注的一种忘我的程度。战国政治家、思想家都有他们的理想社会蓝图和自认为可以操作的治世方略。他们都有拯救社会的满腔热情，都积极创立了自己成体系的学说。诸子如此，史传作者又何尝不如此。

第二，反思和探索相结合。夏、商、西周三代，在社会制度，即“礼”的问题上，虽有增损，但主要表

现为一种相继相承的关系。孔子以成周礼制大备，而盛赞“郁郁乎文哉”。春秋时，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人，还曾谋求恢复西周盛世，恢复周礼。而至战国之世，旧秩序的恢复已经证明不可能。战国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旧传统、旧思想都进行了清理和反思，正是在此基础上，他们创建了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。就是旧有的儒家学派，传至孟轲、荀卿之流，对孔子之学也有新发展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伟大诗人屈原这一艰苦探索，勇于求新的精神，正奏出了当时时代的主旋律。

第三，典雅和通俗相结合。在战国之前，我们可以看到的著作，主要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这五经之中，除了《诗》之十五国风以外，大都为政典。而《诗》之国风，虽则来自民间，但经整理，被之管弦，陈政教得失，其通俗性就打了折扣。而战国辞赋文学，既有民间的影子，又是文人创作，个性鲜明，风格活泼而生动。战国诸子，为了施教子弟，或说动人主，往往不殚辞费地打比方，说寓言，道理是深刻的，语言是通俗的。战国史传，如《左传》扩充《春秋》，为之传释，本身就是在努力实现经典的通俗化。至于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记当时口语，其通俗性，更是无庸怀疑的。

方铭君从我治先秦秦汉文学，以《战国文学研究》一文，为其博士学位论文，受到专家和答辩委员

会的一致肯定。今天，方铭君又把他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整理修订，成《战国文学史》，由武汉出版社作为重点学术著作出版，不久，将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本战国文学研究著作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

方铭君勤奋好学，视野开阔，知识面广，有丰富的古文献知识和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。其《战国文学史》一书，涉及面广，论述细致，概括而言，具有如下特点：

第一，就选题而言，作者把战国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，高屋建瓴，提出一个框架，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代的文学。这是战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，是先秦文学研究的新发展。而该书，也是研究战国时代断代文学史的第一本专门著作。

第二，就研究态度而言，作者具有科学而实事求是的品格。作者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历史的、民族的概念，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规范文学，确定战国文学的研究范围。同时，又熟谙六经、诸子、史传、辞赋，熟悉战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。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，审慎检讨，细致梳理，折衷辨析。宏观与微观结合，理论阐述与考证辩驳结合，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。这种研究方法是应该提倡的。

第三，就内容而言，作者对战国时代社会思潮、作家作品的存佚情况、思想内容、艺术特点作了详细、具体而不乏深度的论述，如书中论述了战国时代新气

象，把道家区分为黄老道家与杨朱、庄子道家，提出了《黄帝四经》文学思想的研究，关于战国文学与孔子及六经的关系，对屈原悲剧性的认识，以及总结战国文学的主流与战国文学的特征等，论述既持之有故，言之亦自然成理，均可供研究者参考。

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，方铭君富于春秋，假以时日，勤奋进取，一定会作出更大成绩。任重而道远，我期望着他对战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、古代文化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，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。

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

目 录

序	褚斌杰
---------	-----

引言：战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及方法	[1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战国时代新气象	[23]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一节 旧秩序旧道德的崩溃与新秩序 新道德的建立	[23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二节 改革成为新时代的首要任务 ..	[32]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三节 追求独立人格的士是战国时代 最有活力的力量	[39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四节 理性精神支配着战国人的思维 活动	[51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五节 怪诞神秘的诡奇心理	[70]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二章 战国文学之繁荣	[75]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一节 私家著作出现于战国	[75]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二节 文学体裁及流派的多样化	[83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三节 自觉的创作意识及现实使	
-----------------	--

命感·····	[104]
第四节 战国的文学肯定论·····	[109]
第五节 战国的文学否定论·····	[131]
第三章 战国论说体文学·····	[142]
第一节 仁者爱民——从《论语》到 《荀子》·····	[142]
第二节 道术足以御民——从《黄帝四 经》到《道德经》·····	[160]
第三节 “为我”是大道德——从杨朱到 《庄子》·····	[169]
第四节 利害是人际关系的根本—— 从《法经》到《韩非子》·····	[179]
第五节 我也有救世良策——战国其他 诸子著作的内容·····	[189]
第六节 辞达而已矣——战国诸子散文 的写作艺术·····	[202]
第四章 战国叙事体文学·····	[240]
第一节 文以载道——战国史传文学的 主题·····	[240]
第二节 以小说笔法写史传——《左传》 的写作艺术·····	[262]
第三节 个性之言寓于叙事之中—— 《国语》的写作艺术·····	[276]
第四节 以气驭文——《战国策》的写 作艺术·····	[292]
第五章 屈原及战国抒情体文学·····	[307]

第一节	虽九死其犹未悔——屈原行为的悲剧性·····	[307]
第二节	发愤以抒情——屈原的创作主旨·····	[341]
第三节	奇文郁起——屈原楚辞文学的艺术特点·····	[361]
第六章	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·····	[385]
第一节	最后的楚辞——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与《大招》·····	[385]
第二节	信兴楚而盛汉——宋玉及战国赋文学·····	[411]
第七章	战国文学主流及其历史地位·····	[427]
第一节	战国文学主流·····	[427]
第二节	战国文学与六经及孔子·····	[431]
第三节	战国文学的历史地位·····	[450]
第四节	战国时代及战国文学与欧洲浪漫主义运动·····	[460]
	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	[488]
	跋·····	[495]

引言：战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及方法

一、“战国”一词由指战争时争战的诸侯国之词义延伸为指战国时代。

“战国”一词的词义，本来不是一个时代名称，而是指战争时代处于战争状态的诸诸侯国。如《管子·霸言》云：

强国众，合强以攻弱，以图霸；强国少，合小以攻大，以图王。强国众，而言王势者，愚人之智也；强国少，而施霸道者，败事之谋也。夫神圣视天下之形，知动静之时，视先后之称，知祸福之门。强国众，先举者危，后举者利；强国少，先举者王，后举者亡。战国众，后举可以霸；战国少，先举可以王。

《管子》一书，其成书时代虽在战国中后期，但托名管仲。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，因此，我们不能断言《管子》一书的所有词汇，必然出于战国，也正因此，对于“战国”一

词出现的时代，我们不能明确地肯定是出自春秋，抑或战国。但是，从《管子·霸言》篇的语义而言，“战国”指的是处于战争状态的诸侯国。《管子·霸言》的作者认为，在有很多列强的时候，与强国联合，攻击弱小国家，可以成就霸业；而当强国较少的时候，联合小国，发展壮大自己，最后可以消灭很少的强国，因而王天下。强国林立而欲王天下，强国少而谋尊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，是愚人之谋，惟能败事。圣人应该根据社会变化，及时调整策略，了解行动的轻重缓急，先后顺序。强国众，先举，则必为强国所图；强国少，后举，必为先举者亡。争战之国众，坐山观虎斗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；争战之国少，先发可以制人。这种基于策略上的考虑，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大乱、社会动荡中积累的宝贵经验。

“战国”一词的大量出现，在刘向编辑的《战国策》中最为显著。《秦策四》顿弱云：“山东战国有六。”《楚策二》昭常云：“今去东地五百里，是去战国之半也。”《赵策三》马服君赵奢云：“今取古之为万国者，分以为战国七。”《燕策一》苏代云：“凡天下之战国七，而燕处弱焉。”凡此，“战国”一词，皆指战国时代争战诸诸侯国。

《史记》之言“战国”，大抵也是指争战诸国。《六国年表》曰：

惜哉，惜哉！独有《秦记》，又不载日月，其文略不具，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，何必上古。

《天官书》云：

田氏篡齐，三家分晋，并为战国。

《匈奴列传》云：

当是之时，冠带战国七。

又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引齐人严安上汉武帝书曰：

田常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并为战国。……及至秦王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称号曰皇帝。

可以说，《史记》中关于“战国”一词，尚无明确可以视为时代概念的例证。

但是，战国以指战国时代，最晚当不晚于西汉刘向。《汉书·高帝纪赞》云：

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。

颜师古《汉书·高帝纪注》云：

春秋之后，周室卑微，诸侯强盛，交相攻伐，故总谓之战国。

又引文颖之言曰：

六国时，秦伐魏，刘氏随军为魏所获，故得复

居魏也。

“六国时”即战国时，“战国”是战国时代诸战国之共名，又是“战国”所处时代之名。案以争战为核心事务的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等战国所处的时代，命名曰“战国”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所以，《汉书·沟洫志》引汉哀帝初待诏贾让奏言曰：“盖隄防之作，近起战国，雍防百川，各以自利。”^①此处“战国”，若解为争战诸国或战国时代，于训诂皆无碍，因为对后人来说，战国时代是战国的时代，而战国存在于战国时代。

“战国”一词，作为时代之名，虽不必出自刘向，但刘向对“战国”一词作为时代名称的传播，其功难以抹杀。此可譬之于孔子《春秋》，“春秋”一词不自孔子《春秋》始，但《春秋》以记春秋时代，“春秋”作为时代之名，自孔子作《春秋》为始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刘向编辑《战国策》时，可能战国已是时代名称，而孔子编《春秋》，则鲁隐公至鲁哀公的时代，却未必称为春秋时代。刘向《战国策叙》云：

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，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
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其事继《春秋》之后，讫楚汉之起，
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，皆定以杀青，书可缮写。……
战国之时，君德浅薄……。

刘向运用“战国”以为时代名称，见诸文献记载，所以，“战

^① 颜师古注曰：“雍读曰壘。”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注。

国”作为六国之时代名称，最迟至刘向已极为普遍，普遍到可以使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以之为书名，以之上书皇帝陛下。台湾学者陈东林力主“战国”作为时代名，应不自《战国策》始，大概也是缘于此故。^①

知道了“战国”的含义及缘起，就可以框架战国时代的起讫之年。司马迁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引严安之言，及刘向《战国策叙》，已明确了定义战国时代的起讫线，即：

1. 战国时代为《春秋》时代之后至秦统一。

2. 战国开始的标志为田氏篡齐，三家分晋。

《春秋》绝笔于鲁哀公十四年，即周敬王三十九年，公元前481年。周安王二十三年，即公元前379年，齐康公卒，田和并齐而自立为齐侯。周安王二十六年，即公元前376年，魏武侯、韩文侯、赵敬侯共灭晋，而三分其地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统一中国，为始皇帝。战国终结的年代只有一个，而始年则相差较大，《春秋》绝笔至田和篡齐，三家分晋，约百余年。而司马迁《六国年表》始于周元王元年，即公元前476年，至于秦二世三年，即公元前207年，凡二百七十年，与《左传》迄哀公二十七年，即周贞定王元年，公元前469年相交接。^② 宋神宗御制《资治通鉴序》曰：

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
……起周威烈王，……光之志以为周积衰，王室微，

^① 陈东林：《论中国战国史》，台湾益民丛书出版社。

^② 《辞海·中国历史纪年表》以周元王元年为公元前475年，周贞定王元年为公元前468年。

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平王东迁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。桓、文更霸，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。威烈王自陪臣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周虽未灭，王制尽矣。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。

《资治通鉴》因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即公元前403年，周威烈王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”^①，破坏礼制名分，而为一划时代之举。

由于以上分歧，关于战国的起点，有人主张应以公元前403年为准；但春秋结束在公元前481年，春秋战国之间有七十七年真空，所以有人主张把战国开始年代提前到公元前480年；有人主张把春秋结束年代推迟到公元前403年；还有人主张把魏、赵、韩灭亡智氏的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。^②

本文并无意于探讨战国时代起讫的准确时间，但为了叙述的方便，按照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的划分，以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的大致起讫时代，尤其强调孔子作为春秋时代代表的象征意义，即以后孔子时代为研究的开端。因此，在具体资料运用上，并不一定严格地以公元前476年及公元前221年为取舍标准。但有一条是明确的，即成书于孔子去世之后，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文学著作，都是我们的考察范围。

二、战国时代文学的概念与今天所谓文学不同。

“文学”一词的出现，始自孔子。孔门四科，有文学一类，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。

^② 参阅杨宽《战国史》。